台湾清史研究一瞥（续四）

戎　笙

已、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台湾学者多数称之为自强运动或同光新政，也有称之为洋务运动的，但很少。所谓自强运动，指的是“师夷长技”以建立兵工厂、矿冶业、轮船、机械织布、铁路与电线等新的建设事业，以“图富”和“求强”。甲午一战，惨败于后起的日本，标志着“图富”“求强”的努力失败，故以甲午战败作为这次运动的下限。吕实强在《丁日昌与自强运动》一书中，解释“洋务”一词的词义是“指自英法联军以迄甲午战争，中国因受外力冲击，而采用西法以求强兵富国所作的种种措施，包括对外交涉与采用工业及军事技术等事”。台湾学者是把自强运动纳入中国近代化的问题中进行研究的。有的学者甚至把“自强新政”和“近代化运动”看作是同义语。比较普遍的看法是，这次运动上承鸦片战争、下启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是一脉相承的政治运动。洋务运动涵盖的时间长达三十余年（1862—1894），所以对洋务运动的研究，是台湾史学界的一个热门课题。选题比较广泛，或就一人，或就一事，写成论文或专著，通论整个洋务运动的不多见。有些学者还把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加以比较。从政治革新、社会风气、守旧派阻挠、企业经营管理、向外国学习（包括派遣留学生）、从国外购进新的技术装备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分析洋务运动的成败得失。在史料方面，则充分利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总理衙门档案和外文资料。评价虽有分歧，但基本上都是肯定的。他们赞扬洋务派的头面人物，因国家积弱遭受列强侵略而猛然惊醒，在守旧顽固势力的包围中奋发图强，但由于知识准备不足，只学得一些皮毛，“图强”“求富”以失败告终。对于与洋务运动相始终的头面人物李鸿章，评价分歧最大，褒贬对立，互不相让。分歧焦点集中在李鸿章的外交活动和他个人的品德方面。

对洋务运动持全盘否定态度的也有，例如胡秋原。他在《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一辑的序言中说：“……而清廷终得以不平等条约之让步，换得洋兵之助剿。自此中国在外国势力塑造之下，中国社会日趋解体而破形了。洋务运动正是在外国造成的格架之下，中国社会歪曲之中进行的。洋务家所见的外国世界已因中国社会之歪曲更非其真相，而其努力之洋务，在外国人之格架之下亦不免是补充其格架，亦即使中国社会经济成为外力之附庸。结果，原欲‘师夷长技以制夷’者，变为师夷末技以崇洋，原欲‘以夷制夷’者，变为恃洋人之力以自制其同胞。新文化运动后，‘洋’与‘新’同义。于是种种新潮家各以其所闻之新为是非之标榜。”如果只是说到这里为止，倒也不失为学术上的一家之言。可是胡秋原接下去把“五四”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都说成是“洋务”而加以全盘否定。按政治偏见曲解历史，离真理十万八千里，这可算作一例。

台湾绝大多数学者不是这样研究洋务运动的，他们认为，兴办洋务运动的时代背景是列强的入侵，首先是鸦片战争。近代史研究所现任研究员吕实强在《中国早期的轮船经营》一书中说：“鸦片战争的失败，原因虽然很复杂，但船炮军械的不利，实在是一项决定性的因素。在战争期间，为了抵抗英人，林则徐在广东曾购买过若干外国船炮，以为战守的工具，

而沿海各省也曾纷纷从事洋船与火器的仿造。”可惜战争结束之后，朝廷苟安，疆吏因循，以至这类刚刚创办的新事业，都次第停业。只有少数通达世变深体时艰的志士林则徐、魏源，才认真总结这次战争的教训。

促使洋务运动兴起的决定性因素，是英法联军之役。如吕实强指出："直到英法联军复挟其瞬息千里的轮船，无坚不摧的炮火，两度攻陷津门，至于占领北京，陵寝被扰，淀园被焚，创伤深重，屈辱备至之后，洋人船炮的威力，方再被普遍的留意。于是在少数比较开明的政治领袖人物，如恭亲王（奕䜣）、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内外呼应之下，方形成一种模仿西法的自强运动"。

也有学者指出：和太平军的对垒，也是促成曾、李、左等人兴办洋务的因素之一。当时的太平军，没有什么排外情绪，很重视洋枪洋炮，并已在军中大量配备外洋枪炮，给清军以很大威胁。王尔敏在《清季兵工业的兴起》一书中指出，至迟在咸丰三年（1853年）"洋人已在以西方武器接济太平军"。同治元年八月，李鸿章部淮军洋枪小队，只有千杆洋枪，而这时李秀成所部太平军"专恃洋枪，每进队必有数千杆冲击，猛不可当。"许多洋人卖洋枪洋炮给太平军，甚至常胜军统领戈登也与太平军进行军火交易，太平军还雇用两名英国人制造新式武器。同治元年李秀成回援天京时，洋枪多至两万杆。和太平军直接作战的曾、左、李等人在国内战争的战场上，又一次领略到西洋火器的凌厉。

原来是不承认西洋人有什么长技的，在战争中挨打才认识到西洋人确有"长技"，而这"长技"就是洋枪和洋炮。所以兴办洋务先从购买洋枪洋炮开始就不奇怪了。随着对西洋"长技"的知识增多，兴办洋务的范围也逐步扩大，从购买枪炮到购买轮船，从向外国购买到由本国制造，从造枪炮到造轮船，从造枪炮轮船到开矿、采煤、炼铁、修建铁路、架设电话，从军用工业到民用工业，从兴办洋务企业到培养洋务人才、改革教育、派人出国留学等等。三十年间，从发蒙学步，到建立一批近代工业企业，都是随着对"夷之长技"的认识增多而逐渐扩大范围的。在这个过程中，每办一事，都遇到顽固守旧势力的阻挠，受到洋务派自己的守旧思想的束缚，以及外洋知识欠缺的困扰。台湾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从对列强认识的思想轨迹来看，从以天朝上国自居瞧不起洋人，到承认西洋人有"长技"并从而师之，毕竟是一大进步。

同治初，曾国藩首先奏请"陆续购买洋枪洋炮"。李鸿章的思想更进一步，主张自己仿造，并得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支持。同治年间，官绅之中对"师夷长技"有精辟而独到之认识者，实以李鸿章为第一人；其次，封疆大臣中，倡导模仿"西法"以图自强者，则以左宗棠和曾国藩为代表性人物。

朝廷中的支持者是颇识时务的恭亲王奕䜣，他早就主张派人出洋学习制造，并非常留意日本的变法自强，同治六年二月关于日本动态的奏报可以代表他的思想和主张。

大陆学者在洋务运动的目的、性质和作用等问题上，正在展开激烈的争论，目前尚未取得一致的认识。台湾学者一致认为，办"洋务"的背景是痛感"夷祸之烈"，能否掌握西洋火器是清政府存亡的关键，办"洋务"的方法是"师夷之长技"，目的是发愤图强，所以称为自强运动。

以慈禧太后为权力中心的朝廷这个圈子里，对"制夷"有兴趣，对"师夷"则感到有失体面，说到"长技"则不承认外洋有什么"长技"，不过是"奇技谣巧"。这一批人形成守旧顽固派，成为同光新政的强大阻力。这批人阻挠改革的代表性言论主要是：嗤之为奇技谣巧

"不必学"，认为洋人诡谲"不能学";强调"华夷之辨"不应学；堂堂大国"奉夷人为师"是可耻的。他们认为在战场上，洋枪洋炮不足恃，要靠道德品行取得胜利，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他们反对设同文馆学习洋文，又反对学造枪炮轮船，以及为了制造船炮而设置的天文、算学馆，以后又反对修铁路。这种反对势力是相当强大的。

现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的王尔敏在《中国近代之自强与求富》一文中说:"自强运动，主倡者固极力推广施行，而反对者则无时不在阻挠，而这种势力之大，很为一种雄厚的障碍。京师为朝政中心，当是自强运动之策划中枢，但也是反对派的大本营，支持新政者，除总理衙门以外，即令实有同情之人，也可以比于凤毛麟角。在这种环境声势之中，恭亲王等人，能坚持镇定，一意推行，诚非寻常魄力。京师而外，除沿海沿江口岸及省邑尚有不少开明人士，鼓吹自强运动，其余内地，又是极雄厚的反对势力，成见极难破除。是以推行新政，不惟须甘承怨谤讥嘲，还须平心静气，开导劝说。今日探讨其间故实，不得不敬佩他们的识见毅力，而更可敬者则是他们的宏量容忍。"谢延庚在《李鸿章倡导洋务运动的背景》一文中说:"从旁作梗的守旧派却犹影之随形，无时不以悠悠之口，如椽之笔，给予沉重的打击，以致不知有多少建设的兰图，因而付诸流水。"赵中孚把守旧派阻挠改革作为历史上的普遍现象从理论上加以概括。他说："传统社会从事现代化的改革，是一条痛苦而漫长的路途。若干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都肯定这是无可避免的现象。因为传统社会的文化价值、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对新事物的对抗力量无比巨大；其破坏——重建——整合的过程也相当复杂。与新兴国家的改革有基本上的差异。中国是个典型的传统社会，自然不能免于困扰。"(《近代中国军事因革与现代化运动》,载《近代史所集刊》第十二期）有的学者还指出，这种传统思想的困扰，不仅来自守旧派，就是那些倡导洋务运动的头面人物，由于自身传统思想的束缚，对于一些新事业一开始也是坚决反对的。例如同治初年，容闳、王韬等人就倡言修建铁路，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当时都是反对的。即通达洋务如沈葆祯者,也认为修建铁路"铲削地脉，废山川之险阻，扰害坟墓，启百姓之衅争。"

办洋务少不了要和外国人打交道，其中有无丧权辱国的活动，这是评价洋务派历史功过的关键问题。台湾学者一般不认为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明确指出在技术上完全仰赖外人，其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正如张玉法所说："中国当时在技术上完全仰赖外人，但所仰赖的外人不一定学有专长。只是因为他们有机会与中国有关人士接触，中国便用了他们。协办福州船厂的日意格、德克碑，均非精通造船之士。""日意格并不一定有意为中国造旧式船只，他对轮船的知识也是有限的。因为日意格所造的船并非新式，仍无法应付西方的威胁。"所以1884年马江海战发生时，福州船厂制造的扬威、伏波、济安、飞云、振威、福星等号，于十二分钟内全为法国舰队击毁。张玉法继续写道："无论是购船或委外人造船，其性能必均为外人所熟知，这在国防设计上已居于劣势。福州船厂由法人协建完成，不仅所造船只之性能尽为法人所知，即厂房一切设备法人亦无不知晓。法军之所以能在1884年于匆刻间将福州船厂及其所造的部分船只加以破坏，岂非因国防秘密尽委外人之故!"(《福州船厂之开创及其初期发展》)

洋务运动之初发生的李泰国、阿思本兵轮案，是说明洋务派如何处理涉及中国主权问题的一个例证。吕实强在《中国早期的轮船经营》一书中，根据近代史所收藏的总理衙门档案，对此作了深入的研究。他指出由于"李泰国野心太大，擅自与他所雇用统带兵轮的英国海军大佐阿思本，订立有损中国主权的合同条款，使中国政府在万不得已之中，将这一批舰只

于甫经到华，尚未验收，即忍痛全部退回英国。”有损中国主权的合同条款，例如自行拟定舰队司令、舰长人选以及自行设计外洋模式的舰队旗帜等等，总署及李鸿章等都是坚决反对的。经过反复谈判达成协议，军舰退回，官兵水手遣散。由于此事，总署免去了李泰国总税务司职务。

台湾学者普遍以中日甲午之战作为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并从各个角度分析了失败的原因。1979年学生书局出版的李守孔的《李鸿章传》说:“鸿章只能在旧政治机构下进行一枝一叶之改革，而此旧政治机构反而阻碍新政之推行。此外，同光年间之自强新政，仍有以下数点弊端。”他列举四点：一、财政权操在督抚之手，何处应兴建何种新式企业，无通盘之计划。二、各种工业官督商办之结果，无企业之精神，有官场之恶习。“以招商局为例，船式陈旧，用人较太古、怡和等公司多三倍以上，每一轮船引用亲朋挂名分肥至二三十人之多。”三、各项新政主持人，以杂佐出身者居多，“当时惟容闳、郭嵩焘对外界最有认识，可惜未能尽用其才。”四、“一切设施多以军事为出发点，无健全之人身制度，而所聘洋员多非上乘之选，技术落伍。”王尔敏的《清季兵工业的兴起》一书，肯定洋务运动在兴建兵工企业中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了它的种种弊端，而主要弊端为经营不善。他说：“清季五十年间，致力创建兵工业，大小机器局达数十所，以应国防所需。虽使军器利用进入一个新的境界，追随着欧西的进步，建立起具有复杂系统的生产体制，但就其在国防上的实际效益言，产量不敷应用，不足以支持任何战役；成本高而产品不够精良，未能发挥新式兵工业的效率；程式不一致，各军混乱使用，适自我形成极大的障碍。由此数端，已足以减低其在国防上的支持力。此中原因，非为经费不足，实太半由于不善经营所致。”

彭泽周在《大陆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把汉阳铁厂与日本的八幡制铁所加以比较，在这篇题为《汉冶萍公司与日本的初期关系》一文中，彭泽周说，张之洞在清末诸督抚中算是精明能干而有远识的人物，但他没有办近代产业的科学知识与经验。督两广时，计划在广东建铁厂，后调任湖广总督，便把冶铁机器运到湖北，原料、燃料、运输事先并无周密计划，动工建厂才派人四出找煤。彭泽周把它和日本企业进行比较说:“八幡制铁所在创建之际，明治政府感到自己对于经营近代钢铁厂的经验与技术都不够，乃于1896年派了一批专门人才赴欧美各国考察。这批专门人才归国后，便按欧美各大钢铁厂之管理、组织诸法来经营八幡制铁所。因此，八幡制铁所在创立之初，就具有近代工厂的形式与内容。反之，中国的汉阳铁厂是怎样呢？张之洞经营汉阳铁厂可以说与李鸿章经营江南制造总局及天津机器局，左宗棠经营马尾船政局一样，都是把这些近代的产业机构当作衙门，工厂里养了一批对于近代产业毫无认识，在科学技术上也一无所能的大小官僚。”彭泽周说：“这种封建而落后的经营方法，直到官督商办时期也仍在继续着。当时的汉阳铁厂只不过是一个具有近代产业的形式，而无近代产业内容的工厂罢了。”

综观台湾学者论述自强运动失败的原因，主要是说阻力太大，知识不够，不善经营，变法主张不甚彻底等等。萧一山概括说：“他们领导的自强运动，大声疾呼，要赶上西洋的科学。可惜他们还不甚彻底。所以始终未能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奕䜣、李鸿章的自强运动，所以不能贯彻到底，一半由于他们的知识不够，一半也由于社会政治的阻碍太大。但他们费尽苦心，出来提倡，为新事业推进一步，已有相当的成绩。”傅乐成著《中国通史》概括说：“他们只知道仿造西洋的船炮，而极少注意到西洋的政治及教育制度，以求根本的改革。及至甲午一战，为后起的小国日本所败，若干士大夫，始知非革新政治不足以图存。德宗也以

外患日亟，决心变法。”这几段话，大体上概括了台湾学术界目前流行的看法。

庚、中日甲午战争

中日甲午之战，也是台湾史学界很感兴趣的研究课题，有不少专题论文和专著问世。此外，李守孔著《李鸿章传》，雷禄庆的《李鸿章新传》、包遵彭的《中国海军史》，也有相当多的篇幅论及这一问题。林明德著《袁世凯与朝鲜》是研究战前中日外交斗争的很有价值的专著。

研究甲午战争，首先碰到的是资料鉴别问题。特别是一些常用资料如《东方兵事纪略》、《中日兵事本末》、《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冤海述闻》等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事实真象。由于所据资料不同，结论便完全相反。许多见解的分歧，是从对资料的信疑开始的。郑天杰、赵梅卿合著《中日甲午海战与李鸿章》一书指出的萧一山《清代通史》中有关甲午海战的错误，一部分由于对史料疏于考证，一部分由于缺乏舰艇装备及海战知识所造成的。

台湾史学界在下列问题上的意见大体是一致的：如甲午战败标志着“图强”、“求富”的失败，战前的国际环境，战争的起因，战败的严重后果，台湾军民的抗日斗争等等。分歧点主要在于，海战实况（如参战舰队力量对比、接敌阵形）人物评价（如刘步蟾、方伯谦、丁汝昌）失败原因及海军建设中的问题等等。特别是对李鸿章的评价，对他战前的外交策略、战略指挥及战败缔约，分歧最大。

关于战争的起因，林明德的《袁世凯与朝鲜》一书说：“此一战争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大陆政策的侵略性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个问题上，大多数学者的意见是一致的。林明德还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的学者千篇一律将战争责任片面诿之于清政府。战后，仍有少数人如竹内好，以及美籍学者康莱所谓的日本之正当防卫论，极力为日本侵略政策辩护，然而最近历史学界（尤其日本）已有一共同的见解，咸认日本帝国主义蓄意侵略朝鲜，是为甲午战争的原动力。即使抨击李鸿章、袁世凯政策最烈的韩国学者，亦不能将中国的‘干预’与日本的‘侵略’等量齐观。”

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黄福庆在《甲午战前日本在华的谍报机构》一文中认为，汉口乐善堂与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及其分支机构，在中国各地广泛进行调查活动，“提供给日本军部不少宝贵情报，对大陆政策的策划上颇多贡献。”黄福庆指出:“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对外扩张思想早已萌芽”,“维新政府自其成立之初,其根本方针即带有浓厚的军国主义侵略思想”。

关于战役的研究重点在海战，争论较多的是黄海之战。

致远舰中雷沉没，邓世昌镇定指挥，全舰官兵壮烈牺牲，无一生还。萧一山的《清代通史》,包遵彭的《中国海军史》都是根据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的记载，对致远舰沉没前的许多细节作了生动的描述。郑天杰、赵梅卿对此提问：“引述邓世昌对陈金揆之言，最后奋掷自沉，殊感生动，不过‘舟中二百五十人（并陈金揆）皆溺死’，姚著谓‘船众尽殉’，罗著则谓‘全船皆殉无逃者’，吾人深信死事之烈，却不解此中之细节，萧先生从何而得知之？”

甲午战争期间中国海军实力如何，参战舰队与日方力量对比如何，历来说法不一。这不仅影响对甲午战败原因的分析，也涉及对洋务运动的评价。郑天杰、赵梅卿合著的《中日甲午海战与李鸿章》对牙山海战（丰岛海战）、大东沟海战（黄海海战、鸭绿江海战）、威海卫攻防战均详细列表叙述双方实力的比较，包括舰种、船材、排水量、设计速度、主炮、辅炮的种类和数量、鱼雷发射管数量、官兵人数、舰龄，以及威海卫军港所属炮台军备、威海

卫港内北洋舰艇及陆军车骑和日方陆海军兵力等等。该书对双方实战兵力作了如下概括：(一)丰岛海战：日舰队共3艘，计11106吨，北洋共2艘，计3300吨，吨位之比，中方为日方29.7%，炮力更差。(二)大东沟海战：日舰队共11艘，计39684吨，北洋舰队共12艘，计34420吨。吨位之比，中方为日方之88.5%，炮力则更差。(三)威海卫攻防战仅以残余舰炮辅助陆海防守，战力更是悬殊。他们认为，中国海军之力强于日本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他们不同意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大纲》中对中国战败原因的分析。蒋说："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海军占世界海军第八位，日本的海军占第十一位，我们的失败不是因为船不如人，炮不如人，实在是因为战略战术不如人。"周弘然的《维新运动与民主》一文也沿袭了这一观点。

包遵彭的《中国海军史》也列表说明中日海军参战军舰的主要性能，比《中日甲午海战与李鸿章》一书详细，增加了各舰长度、宽度、各部位铁甲厚度、吃水、马力、制造厂等栏目。两书所列表格都有力地说明，中国海军之力强于日本的说法是不可信的。但海战失败的原因，两书各执一说。

甲午海战为何失败的问题，分歧由来已久。一部分学者认为，由于海军经费移筑颐和园。最早是梁启超提出的，以后不少人沿袭此说。包遵彭的《中国海军史》1951年初版时亦主此说，再版时认为这一说法错了，改为海军 费存款生息修筑颐和园。

吴相湘认为甲午海战失败是由于海军"不注意精神及技术训练"所致，他在《清季园苑建筑与海军经费》一文中说："综合各种甲午海战史研究，这一海战胜败关键并不全在中国兵船数量少，本质差，中国海军官兵作战精神及技术不如日本，却是最重要原因。"(《学术季刊》三卷二期）萧一山也认为应由海军官佐负主要责任。他取材于姚锡光所著纪略，泰莱的海战见闻，加上自己的揣测，认为海军官佐作战不力，胆怯畏敌，临阵脱逃。诸如方伯谦藏身于济远舰铁甲最厚处，逃至旅顺而以捷闻；林泰曾带领镇远舰畏日逃走；刘步蟾胆怯，接敌阵形紊乱；扬威与济远两舰在海上相撞；闽人结党胁帅，而壮烈牺牲者是广东人邓世昌。郑天杰、赵梅卿合著的《中日甲午海战与李鸿章》就萧一山所据资料，逐点予以反驳。指出萧一山据以立论的资料是不可靠的，又不注意前人的考证成果，对当时海军装备及阵战不甚了了，凭空虚构，以致"是非颠倒，责任不明"。郑赵二人认为，甲午海战惨败，实由李鸿章负完全责任，战前不作充分准备，只求外交周旋解决。战争开始，仍然缺乏作战意念，一味退让避战保守。战败之后，李鸿章又诬杀方伯谦，为自己开脱罪责。李守孔在《李鸿章传》中也指出，李鸿章应对甲午战败负一定责任。他说："甲午战争之失败，海军舰旧，陆军兵单，以及清议之误国，固均为重要原因，然倘鸿章能力筹战守，争取主动，亦可稍收功效，不致一败涂地。"

对李鸿章的评价，台湾学者各持己见，褒贬不一。但对李鸿章的外交活动，一般都持批评态度。认为他对列强，不论大小，力持忍让，为"息事宁人之计"。批评他的外交手腕，不过是战国纵横家之故智，联某国制某国，而非近代外交家。如中法越南之役，欲利用英德以制法；中日朝鲜之争，欲利用俄英以制日；德据胶州湾，欲利用英法以制德。都不见成效，反受其害。晚年联俄制日，危害最大。

梁嘉彬列举许多例证，说明李鸿章"少年壮年，只知科举、升官、发财"，"拚命做官"，保持禄位之念极重。"虽奉使出国，于国仇国难，无所动于中"。梁嘉彬认为，"研究李鸿章之外交又应先以研究李之人格始矣"。对李鸿章的外交活动持赞扬态度的也有。如萧一山在向大众普及历史知识的简本《清史》中就说："他支持晚清政局，身任外交要冲，其眼光

毅力，都值得我们佩服。他的世界知识，国事见解，比较一般人高，他是推行自强运动的中心人物。他练淮军要用洋枪，办交涉要顾现实。”“马关议和，被狙一击，忍辱受窘，溅血报国，也有可以相当原谅的地方。”并借用梁启超的话赞扬说：“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国家积弱，外交难办，舍隐忍迁就外，李鸿章没有别的选择。也有人对此持有异议。李恩涵以丧权辱国的“崇厚条约”为例，说明李鸿章与左宗棠的外交方针完全相反，左宗棠采强硬方针，积极备战以武力为后盾，谈判桌上据理力争，最后取得胜利。这说明屈辱外交，并非当时的唯一出路。

梁嘉彬批评李鸿章“对外国，无论大小强弱新旧，皆力持忍让。”然“勇于内战，其于洪秀全、捻党诸乱，勇往直前，杀人唯恐不多，杀降唯恐漏网，其于奉慈禧命杀维新党、革命党亦恐不酷。”有的学者列举许多例证，说明李鸿章在外交活动中，有贪财受贿行为，而且数字很大。如果考证属实，则李鸿章是清朝历史上又一著名的贪官。

美国学者曾小萍教授作清代经济史学术报告

1985年7月22日，来华访问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曾小萍应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作了关于美国研究清代经济史问题的学术报告。来自社科院历史所、经济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和清史所，以及北京经济学院的清史和明清经济史专家、学者怀着浓厚兴趣听了报告。

曾小萍教授是《清朝十八世纪财政改革》一书的作者。该书曾获1984年美国菲力普·利连撒尔东亚研究奖金。曾小萍报告中首先介绍了美国五十年代以来研究中国清代经济史的情况，特别是“分配派”、“技术派”、“哈佛派”的观点。她说，现在美国年轻学者正在努力摆脱所谓中国是一个失败国家的陈旧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内部逻辑。他们认为，世界上并没有一个固定模式，也没有统一的发展道路。每个国家都是按照自己国家固有的文化传统发展的。她很赞赏美国著名经济史权威施坚雅关于区域性研究方法。她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中心与边远区的发展方向不一样，它们怎样互相作用，值得注意。她说，一些外国学者把注意力集中在长江下游地区的社会经济研究上面，往往忽略其他地区的研究，似乎长江下游的社会经济发展就等于中国，这是不对的。她结合研究四川巴县档案，提出了关于清初四川经济和长江下游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清初四川经济所处地位的看法。

曾小萍报告的第二部分内容是介绍美国学者近年来着重研究的两大问题：清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鸦片战争前的清代社会经济结构方案。她对清初直至乾隆中叶以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给予了积极评价，并认为雍正改革前的清政府是一个鼓励小农业和小商人的政府。她还介绍了新著《清朝十八世纪的财政改革》一书的基本观点。

曾小萍教授指出，美国学者很注意人口压力和中国传统思想两个因素，并视为是造成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两大障碍。她认为中国的分散对经济发展有很大影响，中国经济没有发展起来，与它本身的结构因素即过于分散有密切关系。她将清代的经济和同时代的英国经济进行了简单的比较。她认为中国分散太严重，集市的密集就是一种具体表现。中国经济没有充分发展起来，不完全是传统思想的障碍。

曾小萍教授在结束报告时说，她对中国政府，对与美国进行学术交流的中国学者表示衷心感谢。她希望美中学术文化交流继续下去，并得到进一步扩大和发展。　　（秦勋）